



上图：李约瑟教授。

宋代哲学，而我觉得哲学无趣。与中国人在想什么相比，我更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对我的影响更大的是约瑟夫·弗莱彻，亚洲内陆方面伟大的历史学家。遗憾的是，他49岁就去世了，没能活到我毕业。所以后来我又成了菲利普·库恩的学生。

明朝的衰亡

《新民周刊》：您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书中的《致谢》里写到，因为2001年3月参加多伦多大学举办的比较刑罚史学研讨会开始写作这本书，开个研讨会就要写一本书的吗？是不是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凌迟了？

卜正民：学术会议通常是启动项目的好方法。在那次会议之前，我在法律问题上做的研究很少，但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很感兴趣。写这本书是因为遇到了杰罗姆·布尔贡，他比我更了解中国的法律。较早前，他在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上组织了一个研究凌迟专家小组，正在寻找一个评论人。他问历史学者王国斌。王国斌建议我可以胜任。这是我和布尔贡以及其他人在这一领域长期合作的开始，随后才有多伦多大学举办的比较刑罚史学研讨会以及这本书。

《新民周刊》：中国古代帝王实行凌迟，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震慑百姓、防止犯罪，您认为这样的目的有没有达到？

卜正民：凌迟是法律可以使用的最极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惩罚，但却没有能达到皇帝希望它达到的示范效应。罪犯犯罪是基于他是否能逃脱法律惩罚以及他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的考量。每个罪犯都是赌徒，他们赌的是他们不会被抓住，赌赢了，那就是好的，无论处罚多么严苛，这样的考量都不会改变。

右图：卜正民著《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



死刑尤其如此，因为死亡的结果是一样的，不管如何被执行。如果凌迟有这样一个意图：提醒人们它政权有多么强大和可怕，那我认为它改变不了任何犯罪的企图。

《新民周刊》：《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里提到了宦官干政，您觉得宦官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卜正民：我不认为宦官是明朝走向衰亡的一个主要因素。宦官是皇帝的“影子内阁”，所以皇帝不必完全依靠朝廷中的官僚对国家事务做出决断。在明代，宦官机构和行政官僚之间的斗争极富盛名，那是因为皇帝的无能，他在国家领导层中的名不副实，往往既不能控制也不会信任他们的官员。而宦官的行为既不是公开的，也不受法律约束。这就给宦官腐败以可乘之机，让国家资源落入他们自己的囊中，从而削弱了国家应对军事威胁或别的威胁的能力。不过明崇祯时期国家走向灭亡的因素有很多，宦官只是其中一个。如果我们把宦官的因素放大，他们就很容易成为替罪羊。

《新民周刊》：第四章写的是北直隶的水稻种植，您认为水稻的推广种植，对于明代后期人口的增长突破一亿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人口的过度增长是不是为明末的农民起义埋下了伏笔？

卜正民：一般来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是中国自17世纪以来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不敢断定明朝由盛转衰是因为人口过剩，不过，在20世纪，因为医疗和科学对马尔萨斯人口限制论的突破，使得中国背负上了沉重的负担。中国人需要更多的食物和水，而这并不